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 / 梁银峰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730-327-5

I. 汉… II. 梁… III. ①汉语-趋向动词-研究-近代 ②汉语-趋向动词-研究-现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663 号

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



作 者—— 梁银峰

责任编辑—— 刘 嫻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 万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0-327-5/H·34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其中大部分章节已经整理成论文发表或即将发表,现在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给读者。由于论文发表的时间距今不长,收入本小书中的论文大都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这次以论著形式出版,除了个别地方稍作补充外,基本未做大的变动。

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里,存在很多由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语法范畴或语法成分,这些语法范畴或语法成分在句子中承担不同的语法功能,从历史上看,这些语法范畴或语法成分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由连动结构中的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小书冠以“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的标题,不过限于个人的学识和精力,我们未对汉语里全部由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语法范畴或语法成分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穷尽性研究,而只是对若干典型的语法范畴或语法成分发表了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

有几篇文章需要向读者交代一下。第一篇是《论汉语动补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该文既谈了动结式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也谈了动趋式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动趋式复合词的词汇化其实质是复合,即一种涉及语义弱化和丧失词甚至语素之间界限的重新分析,因此,动趋式复合词的词汇化同时也涉及了趋向动词的语法化,这是我们将该文收入本书的原因。第二篇是《〈祖堂集〉中多功能副词“却”的综合研究》,根据一般的看法,“却”不能算作趋向动词,不过它具有[+位移]的语义特征,而且在历史上与趋向动词(尤其是趋向动词“去”)关系密切,所以我们暂把该文也收入了本

书。第三篇是《汉语趋向补语结构的产生与演变》，该文主要由笔者写成，后经贝罗贝和吴福祥两位先生润色，所以应是三人合作的成果，在此特作说明。

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的联系导师江蓝生先生曾就该课题给予我许多热情耐心的指导，课题完成后，江先生和曹广顺先生审阅了大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此外，我还有幸得到了吴福祥先生无私的帮助。三位先生是国内近代汉语学界的著名专家，他们的学风和人格对我日后走上汉语研究这条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那时起，我渐渐对近代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没有他们当初的教诲和引导，就没有这本小书的问世，在此谨向三位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博士后出站以后，我不断对该课题进行修改和完善。后来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有关汉语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就其中的某些专题报告过有关内容，从而有幸得到学术界同行的反馈意见。北京大学中文系董秀芳博士通过书信形式曾给我提出过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使本小书增色不少。值本小书问世之际，在此谨向诸位前辈和同行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小书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经费资助，课题批准号：2005BYY001。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也为本小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谨此表示感谢！

梁银峰

2006年12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汉语趋向补语结构的产生与演变	1
论汉语趋向补语产生的句法动因	
——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出现的三种句法格式谈起	40
论汉语动补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	73
汉语事态助词“来”的产生时代及其来源	104
时间方位词“来”对事态助词“来”形成的影响及相关问题	124
汉语事态助词“去”的形成过程	140
汉语动相补语“来”“去”的形成过程	152
《祖堂集》中多功能副词“却”的综合研究	175
目的标记“来”“去”的形成过程	197
祈使语气词“来”的形成过程	209

汉语趋向补语结构的产生与演变

提 要 汉语的趋向补语结构产生于中古时期(六朝至唐),它是由上古汉语的趋向连动结构发展而来的。导致趋向补语结构产生的演变机制是重新分析和类推。具体说,趋向连动式演变为单趋式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双趋式的衍生机制则是类推。汉语趋向补语的语义演变呈现出“趋向意义>结果意义(>时体意义)”的规律性路径,演变的机制主要是“隐喻”。

关键词 趋向补语结构 重新分析 类推 隐喻

0 引 言

0.1 现代汉语趋向补语结构的形式和语义

在现代汉语里,位移方向可以用趋向动词本身来指称,也可以用趋向补语(directional complements)来表达。充当趋向补语的趋向动词包括单纯趋向动词和复合趋向动词,它们和动词组合,分别构成单趋式和双趋式,列举如下:

(1) 单趋式: a V 上 V 下 V 进 V 出 V 回 V 过

V 起 V 开

b V 来 V 去

双趋式: V 上来 V 上去 V 下来 V 下去 V 进来

V 进去 V 出来 V 出去 V 回来 V 回去

V 过来 V 过去 V 起来 V 开来

如果用“V_d”代表趋向动词,用“N”代表名词宾语,则上述动趋式的带宾格式是:

- (2) 单趋式: a V+V_d+N
 b V+V_d+N / V+N+V_d
- 双趋式: V+V_{d1}+V_{d2}+N
 V+N+V_{d1}+V_{d2}
 V+V_{d1}+N+V_{d2}

现代汉语趋向补语的语法意义可分为三类: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时体意义。(参刘月华 1980,1998)趋向意义表示人或事物在空间的移动方向。结果意义表示情状有了结果或达到了目的,多是从原有的空间趋向义拓展出的隐喻义,诸如“削去皮”的“去”、“贴上邮票”的“上”、“脸上露出笑容”的“出”、“撕下去一张纸”的“下去”、“把事实真相写出来”的“出来”、“醒过来”的“过来”等等。时体意义是结果意义的进一步引申,在语义上不指向句子中的任何论元成分,只指向动词本身,^①已经丧失或基本丧失趋向意义,是属于“时体”的语法范畴。具有时体意义的语法成分有“上”、“过₁”、“过₂”、“起来”、“下去”等,其中前两个语法成分表示情状的完成或实现,或者表示使所陈述的情状成为事实,例如“她开口骂上了”的“上”,“我吃过饭了”的“过”;“过₂”表示经历,例如“我去过北京”;“起来”表示起始,例如“他们忽然哭起来了”;“下去”表示延续,例如“你那样做下去,结果一定不好”。这些语法成分可以看作体标记(aspectual marker)或者“准体标记(quasi-aspectual marker)”。^②

^① 汉语里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有时不好区分,本文所说的“动趋式”里的动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

^② “准体标记”或可称作“动相/状态补语(phase complement)”。

0.2 本文的目的

以往关于汉语趋向补语结构的历时研究,大多关注这种结构式是何时产生的。(参尹玉 1957,杨建国 1959,潘允中 1980,孙锡信 1992,魏丽君 1996)由于学者们对趋向补语结构的句法语义属性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又见仁见智,因而对这种结构式产生时代的看法历来聚讼纷纭。我们认为,研究趋向补语结构的产生,最重要的是弄清这种结构式产生的句法条件和演变机制。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古汉语连动结构中趋向动词如何演化为趋向补语的,其语法化的句法动因和机制是什么。此外,本文对趋向补语的语义演变也略作分析。

1 古代汉语的趋向连动结构及动词的类

1.0 趋向连动结构(directional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是连动结构的一个次类(参 Muansuwan N. 2000),其构成成分主要涉及趋向动词或与趋向有关的动词,^①它广泛存在于古代汉语的文献中。根据动词的语义类别和语序,与趋向补语有关的趋向连动结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空间趋向连动结构,二是主观趋向连动结构,三是空间趋向和主观趋向复合型的连动结构。

在具体讨论趋向连动结构之前,还需要对构成趋向连动结构的动词进行分类。按其语义特点,趋向连动结构中的动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参 Ross, Malcolm D. 2002):

A. 空间趋向动词 这类动词表示运动主体以某一客观物体

^① 请读者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与趋向有关的动词”是指与趋向有关联的一部分行为动词,下文对趋向动词进行分类时还要提到。

为参照点所发生的空间移动,其特点是动词本身可以表示水平(横向)、上、下等移动方向,这类动词在数量上是相对封闭的,常见的有“上、下、进、入、出、过、回、起、开”等。在古代汉语中,这类动词在句法上可以是及物的(用作使动用法),带使动宾语;也可以是不及物的,带处所短语(locative phrase),^①例如:

(3a) (公)拜不能起。(《左传·哀公 14 年》){不及物(i)}

(3b) 起之曰:……(《左传·宣公 15 年》){及物(t)}

B. 主观趋向动词 所谓主观趋向即是以说话人为中心,这类动词只限于“来”和“去”,前者表示动作的移动趋近说话人,后者表示动作的移动远离说话人。在古代汉语中,主观参照动词在句法上可以是及物的,这时用作使动用法,带使动宾语;也可以是不及物的,带处所短语(LP)。例如:

(4a) 祭伯来。(《春秋·隐公元年》)| 纪侯大去其国。(《春秋·庄公 4 年》){不及物(i)}

(4b) 子为正卿而来外盗。(《左传·襄公 21 年》)| 竖牛因独养之而去左右(《韩非子·内储说上》){及物(t)}

C. 运动行为动词 这类动词本身虽然不涉及方向性,但它们所表示的动作实现后能造成施事主体(用作不及物动词时)或受事客体(用作及物动词时)的移动。在数量上,这类动词是开放的。在古代汉语中,它们在句法上既可以是及物的,又可以是及物的。汉语语法著作一般将 A、B 两类划入趋向动词,将 C 类划入行为动词(典型动词),本文之所以把 C 类动词称作运动

^① 有些学者认为这类动词带处所短语时应看作及物性的,处所成分是它的处所宾语,如张伯江(1991a),本文为了和 C 类动词相对照,暂时不取这种看法。

行为动词,是因为这类动词和本文讨论的趋向连动结构有密切关系。例如:

(5) 不及物(i)

趋 走 飞 沉 退 跃
遁 逃 游 飘 归 坠……

及物(t)

攻 逐 拨 放 送 掘 驱 扶 招 蹋
持 牵 抱 掷 舁 采 引 脱……

1.1 空间趋向连动结构

在这类趋向连动结构中,第一个动词由 C 类动词充当,第二个动词由 A 类动词充当。前者表示移动的方式,后者表示移动的趋向,两者结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

(i) 当 C 类和 A 类动词都是不及物动词时,句首的名词是两个动词共同的主语。如果带 LP,它一般位于两个动词之后,表示移动的终点、起点或经过点,所构成的格式可表示为: $V_{Ci} + V_{Ai}(+LP)$ 。例如:

(6) 陷入君地。(《左传·成公 2 年》)

(7) 走出门。(《韩非子·内储说下》)

(8) 趋过之。(《国语·晋语六》)

V_{Ci} 和 V_{Ai} 总是按照时间顺序原则组织起来的,在时间上体现了先后相承的关系,在这种连动结构中,“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参戴浩一 1988)。

更常见的情形是,两个动词之间可以插入连词“而”,以显现这

种连动关系。试比较下面两组例子：

(9a) 孔子趋出。(《荀子·子道》)

(9b) 子路趋而出。(《荀子·子道》)

(10a) 走出,遇贼于门。(《左传·庄公8年》)

(10b) 遂走而出。(《晏子春秋》卷1)

这表明 V_{Ci} 和 V_{Ai} 都是句子中的核心动词,连词省略以后,内部结构关系没有变,仍然是等立的复合动词结构。这类结构虽然与现代汉语的动趋式同形,但内部结构关系并不相同。

(ii) 当 C 类动词是及物动词, A 类动词是不及物动词时,受事论元如果出现的话,它位于两个动词之间,同时被赋予了两种句法角色:既是第一个动词的宾语,又是第二个动词的主语,所构成的格式可表示为: $V_{Ci}(+O)+V_{Ai}(+LP)$ 。例如:

(11) 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战国策·楚策四》)

(12) 司马夜引袁盎起。(《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13) 须臾,引一鲈鱼出。……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搜神记》卷1)

“引袁盎起”和“引一鲈鱼出”可分别理解为:引袁盎,袁盎起;引一鲈鱼,一鲈鱼出。这种递系结构很多人习惯称之为“兼语式”。^①不过当受事论元是无生名词时,有时把它看作第二个动词的主语似乎不太合适。试比较以下两例:

^①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接受朱德熙(1982: 162)的看法,兼语式宜看作连动式的一个次类。

(14) 白象即时,向大树所,自拔_·牙_·出。(《杂宝藏经》,《大正藏》4/454b)

(15) 见二人持_·杯_·出,便笑曰:“……”(《幽明录·刘晨阮肇》)

“牙”、“杯”都是无生名词,但“拔牙出”可理解为“拔牙,牙出”,而“持杯出”不能理解为“持杯,杯出”,原因何在?这是由各自的语义关系所决定的。Stewart(2001: 12)把连动结构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果的(resultative),一类是随之发生的(consequential)。在前一类中,两个动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总是成对出现;后一类中两个动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线性排列,体现了语言的象似原则,第二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不是第一个动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两个动词的语义关系是间接的。如在例(15)中,“(杯)出”虽是由“持”造成的,但不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还可以说成“持杯入”、“持杯回”、“持杯过”等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例(14)中,“拔(牙)”所导致的最自然、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结果便是“出”,而不大可能是其他结果,两个动词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①

V_{Ct} 和 V_{At} 之间的连动关系也可由其间可以插入连词“而”、“以”得到证明,例如:

(16) 取_·宝_·玉_·、大_·弓_·以_·出。(《左传·定公8年》)

(17) 因_·引_·而_·入_·塞。(《史记·李将军列传》)

(iii) 当C类和A类动词都是及物动词时,如果受事论元出现,则这个名词是两个动词共同的宾语。所构成的格式可表示为: $V_{Ct} + V_{At} (+O)$ 。试比较以下三组例子:

^① 不过Stewart(2001)认为,在随之发生型的连动结构中,两个动词需都是及物动词,在这一点上汉语与之不同,比如“持杯出”的“出”就是不及物动词。

- (18a) 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之,与复之,孰利? (《国语·晋语三》)
- (18b) 臣出晋君。(《左传·僖公 12 年》)
- (19a) 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三国志·魏书·苏则传》)
- (19b) 鲜虞推而下之。(《左传·襄公 25 年》)
- (20a) 燕将攻下聊城。(《战国策·齐策六》)
- (20b) 季梁请下之。(《左传·桓公 8 年》)

上述例句 b 中的 V_{At} 可以独用,所以 a 句中的“ $V_{Ct} + V_{At}$ ”还不是动趋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格式中的 V_{At} 并非全是表示动作移动的,有些使用的是空间隐喻义,如(20)中的“下”不是表示“由高处向低处移动”的趋向义,而是表示“使脱离”之义,即表示“使受事与拥有者脱离领属关系”,这一意义是从“使受事从原来的依托处脱离”这一趋向意义引申而来。不管“ $V_{Ct} + V_{At}$ ”中的 V_{At} 是使用趋向义,还是使用隐喻义,它们和多数学者所讨论的使成性述补结构都有密切关系,鉴于学界对此类连动结构已多所研究(如尹玉 1957,杨建国 1959,潘允中 1980,何乐士 1984,刘丽川 1984,柳士镇 1992,孙锡信 1992 等),本文不再把它作为讨论的重点。

1.2 主观趋向连动结构

在这类趋向连动结构中,第一个动词由 A 类或 C 类动词充当,用以表明移动的方式;第二个动词由 B 类主观参照趋向动词“来/去”充当,用以指示移动的方向与说话人之间的关系。

(i) 如果第一个动词是不及物性的 A 类动词或 C 类动词,第二个动词是不及物性的 B 类动词,则句首的名词是两个动词共同的主语,构成的格式是“ $V_{Ai}/V_{Ci} + V_{Bi}$ ”。例如:

- (21) 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 (22) 荆轲嘿而逃去。(《史记·刺客列传》)
- (23) 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汉书·高帝纪》)
- (24) 常有双凫从东南飞来。(《风俗通义·正失》)

这类格式在先秦两汉时期很少带 LP,魏晋南北朝以后带 LP 的情形逐渐多起来,这时 LP 既可位于两个动词之后,也可居于两个动词之间。例如:

- (25) 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庄子·杂篇·渔父》)
- (26) 补成衣已,著衣持钵,出国而去。(《中本起经》,《大正藏》4/158b)
- (27) 外国道人入来洛阳。(《古小说钩沉·志怪》)
- (28) 一身独居,人出去其舍,舍中空无有守者。(《佛说七女经》,《大正藏》14/908c)

(ii) 如果第一个动词是及物性的 C 类动词,第二个动词是不及物性的 B 类动词,那么受事论元出现时,先秦两汉时期它只能位于两个动词之间。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受事名词(短语)既是第一个动词的宾语,又是第二个动词的主语,所构成的格式是“ $V_{C_i}(+O)+V_{B_i}$ ”。例如:

- (29) 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庄子·杂篇·列御寇》)
- (30) 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史记·滑稽列传》)
- (31) 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 (32) 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汉书·张骞传》)

先秦两汉时期,不管受事论元出现与否,在“ V_{Ct} ”和“ V_{Bi} ”之间均可以插入连词“而”,可见两个动词都是独立的动词。例如:

(33a) 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精谕》)

(33b) 父曰:“吾闻沔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列子·黄帝第二》)

(34a) 酒酣,王曰:“召相田单而来。”(《战国策·齐策六》)

(34b) 异日,而王曰:“召相单来。”(同上)

上面例子中 a、b 两句表达的意思非常接近,尤其是例(34)两句出自同一篇,可见 V_{Ct} 和 V_{Bi} 之间是连动关系。

(iii) 如果第一个动词是及物性的 C 类动词,第二个动词是及物性的 B 类动词,这类连动结构一般要带受事论元,由于它是两个动词共同的宾语,当它出现时,通常位于两个动词之后,构成的格式是“ $V_{Ct} + V_{Bi} + O$ ”。例如:

(35) 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嫫夫。(《新序 2·25》)

(36) 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史记·三代世表》)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格式同“ $V_{Ct} + V_{At} (+O)$ ”格式一样,有些 V_{Bi} 并非全是表示实际空间位移的,有些使用的是隐喻义,如“洒去药”(《五十二病方·痈》)中的“去”是“去除”之义,是从“使某人离开”的用法直接引申而来的,不表示实际空间趋向义。

1.3 空间与主观复合型趋向连动结构

这种连动结构是由空间趋向连动结构与主观趋向连动结构复

合构成的,一般而言,运动行为动词、空间趋向动词和主观趋向动词按线性顺序依次排列,从一产生这种语序就十分固定。所构成的格式是“ $V_{Ci} + V_{Ai} + V_{Bi}$ ”。例如:

- (37) 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史记·张丞相列传》)
- (38) 征和二年春,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汉书·五行志》)
- (39) 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汉书·五行志》)
- (40) 时诸鸟雀,竞飞下来,食此虫豸。(《佛本行集经》,《大正藏》3/705c)

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尚未发现“ $V_{Ci} + V_{Ai}$ ”之后带LP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大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例如:

- (41) 孙氏妻黄氏,忽见一童子在前,以钗掷之,跃入云去。(《古小说钩沉·续异记》)

2 趋向补语的产生过程及其动因和机制

2.1 单趋式产生的句法动因

大量语言演变的事实表明,一种新的句法结构的产生,最初往往是由语用因素触发的。汉语的趋向连动结构先秦已经出现,历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至少已有上千年的时间。我们很难设想,这种格式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未发生任何变化。如果我们能从语用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趋向动词所在的非常规

句式进行考察,找出某些可以进行重新分析的趋向动词,那么无疑有助于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较难分析的趋向连动结构寻找新的突破口,藉以揭示趋向补语产生的句法动因和演变机制。我们认为,这种重新分析主要体现在趋向动词所在句式的演变。下面具体申述之。

2. 1. 1 NP + V + Vd → V + Vd + NP

先秦两汉时期,充当主语的名词都位于两个动词之前,动词表示主语主动发出的动作和趋向运动,这两个动词构成连动关系(如例 21)。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格式中充当主语的名词的句法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大多数仍出现在句首外,也有少数出现在两个动词之后:语义角色虽依然如故(仍是施事),但语法角色却发生了变化(变为宾语)。例如:

(42)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古辞·相合歌辞十四》)^①

(43) 何况神通感应,不可思量,千里宝幢,百由旬座,化成净土,踊出妙塔乎?(《颜氏家训·归心》)

在“V + Vd + NP”这类格式中,由于趋向动词之后又出现了句法成分,两个动词之间的句法边界削弱了,开始整合为一个句法成分——动趋式。^②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句式两个动词之间的句法边界还未完全消失,连动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位移主体句法位置的改变,导致两个动词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了重新分析,汉语趋向补语的语法化过程

^① 相合歌辞是用丝竹相和,多是汉时的街陌讴谣,南朝宋吴迈远、陈后主和梁元帝等也多次以“飞来双白鹄”为题赋诗,可见这种句法确实反映了汉代以后群众的口语。

^② 这里要注意区分这类格式与“V₁ + Vd₁ (+O)”的不同,因为后者实际是使成式,其中趋向动词用作及物动词,它可以单独带使动宾语,更重要的是,在后两类中的两个动词之前还有施事主语。例如: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史记·孝武本纪》),“招来神仙之属”与“飞来双白鹄”的语义结构关系是不一样的。

便是由此开始的。^① 唐代以后,这类句式就很常见了,这里略举两例:

- (44) 桃源定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刘长卿《寻张逸人山居》,《全唐诗》卷150)
- (45) 坐由(犹)未定,忽然十字地烈(裂),涌出一人。(《敦煌变文·韩擒虎话本》)

“V+Vd+NP”格式在六朝开始大量出现,似乎可从语用的角度来解释。一般而言,常规句式“NP+V+Vd”是对某个事件的客观叙述,而一旦某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叙述者会改为另外一个叙述角度,以强调这种不寻常性,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会采用“V+Vd+NP”这种非常规句式。从宾语的表现形式看,“V+Vd+NP”中光杆名词很少出现,充当宾语的中心名词之前往往有限制或修饰性定语,如上面列举的四例中,宾语的前面就有数(量)词或形容词定语修饰,这一特征也是和现代汉语相一致的(参范继淹1963)。^②

2.1.2 V+Vd+LP → V+LP+Vd(“Vd”限于主观趋向动词“来/去”,“LP”指处所词)

先秦两汉时期,“V+Vd”之后很少带LP,魏晋南北朝以后可以带LP,这时LP既可位于两个动词之后,表示动作位移的终点、起点或经过点;又可位于两个动词之间。本文的调查显示,魏晋南北朝时期LP位于两个动词之间的用例更多,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下面以“去”为例进行讨论。例如:

^① 魏兆惠(2005)也持这种看法。

^② “数词(+量词)+名词”形式话语的不定指性强,在话语交际过程中,叙述者首次引入的新信息往往采用不定指形式,可参张伯江(1991b)。